

国语纲要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编选研究

管贤强¹，郑国民²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2.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20世纪初，外国翻译作品正式进入现代语文教科书，并逐渐成为语文教科书选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有研究从历史视角，梳理国语纲要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发展面貌。文章以1923—1928年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三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套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存在诸多共同之处，都注重艺术价值和现代精神的统一；三套教科书在语体及文学内容方面都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不同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的同与不同，受到文化语境、教育思潮、课程标准、编者理解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国语纲要时期 初中国文教科书 外国翻译作品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6)1-098-05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6.01.019

国语纲要时期，指从1923年《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颁布到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颁布之前的一段时间。1919年，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思想新文体乃至新的文学观念的变迁，进而使得审美教育思潮得到进一步发展。时代风尚的变化直接影响了1923年《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的内容规划，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成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文基础学科中，“蛮夷”的文学作品被纳入“龙的传人”内容体系当中。随着课程标准的颁布施行，外国翻译作品成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转型背景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开始了初中国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这些教科书，一方面遵循课程标准的规划，具有共同的特征，更体现了整个时代的风尚；另一方面每个编者及其编辑团队各自的认知图式，使得他们在编选教科书选文同时，通过筛

选、删节、改编等方式，对某些选文、某些内容有选择地遗忘，呈现了多样面貌。研究者在基本翻阅这一时期五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基础上，选取三套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其外国翻译作品选文课目进行研究，大致可把握这一时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的时代特征，还可呈现民国时期不同编者编写外国翻译作品时个性化特征。三套教科书分别为：《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编，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间初版；《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编，中华书局1924年初版；《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编，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

一、共同特征：注重艺术价值和现代精神的统一

首先看1923年前后出版的两套中学国语教科书的编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研究”(11AZD067)

【作者信息】管贤强(1982—)，男，江苏常州人，教育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行动研究、语文教育史研究；郑国民(1967—)，辽宁建平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育学部副部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辑说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为“本书的选辑，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于学生的领受为标准，至于高深的学术文以非初中学生能力所胜概不加入”。^{[1](144)}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编辑大意称“本书选材，注重下列两个要点：（1）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2）文章务求富有艺术的价值”。^[2]虽然《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并未撰写说明，但纵观上述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一些特点：其一，形式上注重艺术价值，即文学性；其二，内容上具有现代精神。

1. 艺术价值：短篇小说占据主流，应用文开始文学化

两套教科书，除《智识阶级的使命》《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信》《世界语与其文学》三篇选文为演说、书信外，其他翻译作品皆为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尤以小说突出。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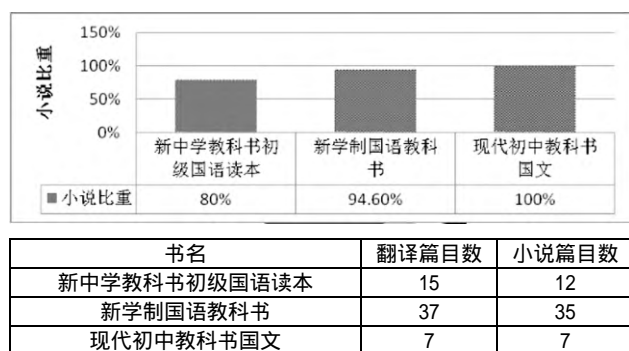


图1-1 1920-1928年三套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中小说的比重

纵观上图所示，三套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中小说大量入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小说在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中比重较大。以《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为例，整套教科书总共入选了15篇外国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入选了12篇（包括传记），所占比重为80%。小说占据主流也体现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之中，该套教科书共收37篇外国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入选35篇（包括传记、儿童文学、寓言等），所占比重为94.6%。在《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中，总共入选7篇外国翻译作品，均为小说（包括故事），所占比重为100%。第二，小说样式丰富，短篇小说、儿童文学特点鲜明。短篇小说是小说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其摆脱了传统小说从头到尾叙述的“纵剖面”方式，运用“经济的文学手腕”，“描写事

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3](144)}两套教科书所有的小说均为短篇小说，最为著名者是都德的作品《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作品《二渔夫》。小说中，人物形象集中，故事发生场景更为聚焦，最后的法语课堂、临刑前的悲惨，可对学生产生心灵的冲击，让学生在小说阅读中思考个人和民族国家救亡之间的唇亡齿寒关系。除短篇小说外，儿童文学也能体现小说艺术价值，教科书中儿童文学样式颇为丰富。王尔德的《安乐王子》空想唯美，“浪漫派气质与童话的体裁相合”；^[4]俄国作品如《鱼的悲哀》《同鸡蛋一样大的谷粒》《铁圈》《巨敌》，或以动物寓言形式，或以空想方式着眼于现实人生；^[5]凡尔纳的冒险小说如《小豪杰放洋记》《荒岛游历记》，充满刺激，强调探险，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包天笑所译的亚米契斯教育小说《亚美利加之幼童》《雪合战》《医院中侍疾之童子》，其中塑造了饱含爱国之情、救国之志的理想少年，以表现无所不在的“爱”和人性的美好。

文学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方面，且在实用文语体、学术文章方面，也有所呈现。这一时期，实用文体已不再是桐城古文的论辩、序跋、箴铭、颂赞、诏令、奏议等文体分类，而是演说、辩论这种适应传播新精神的实用文体样式。演说、辩论文体，胡适在《中学的国文教学》《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1922）中曾予以强调，认为演说、辩论是实用教授法，同时也是用活的语言做的活的教授，这种教授法也回避了封建教育中价值观的单一性，便于现代精神的大众传播。这些实用文本中，语体饱含深情，如爱罗先珂演说《智识阶级的使命》的开头：

我从各方面听说中国没有新文学，现在的中国人中没有大诗人，也没有大著作家，最可悲痛的，是缺少领袖，且只有极少数的人研究或留心去研究文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在这四万万人民的国中怎么只有极少数的文学家和喜欢文学的人呢？这件事是很稀奇的，可是亦很容易解释的。做工作的人没有空闲去学，更没有空闲去研究白费工夫而难见功效的稀奇古怪的中国字。^{[6](10-11)}

演说着眼于政治宣传效果。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从一个来自异国旅行者的所见所闻出发，和听众一起分享其所思所想，在不断的演讲叙述中，听众感受的是演讲者的责任感。从一个异国旅行者的口中谈到中国存在的问题，也着实让人警醒。除实用文体外，即便以文言翻译的学术文章，也包含文学色彩。如“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

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7]译作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鲁迅便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看《天演论》时的情景：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饅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8]

2. 文学内容：具有现代精神

(1) 传统古典文学注重“圆熟简练，静穆悠远”的文风，而新文化运动后，中学教科书中外国翻译文学转为“铺张扬厉，激昂慷慨”的现代文风。^[9]这种激昂的现代精神首先体现于时间叙事的重新建构。传统的时间叙事大多为尚古的历史循环论，而这一时期的外国翻译作品，则开始推崇具有进化意识的历史观。如《天演论导言七》（赫胥黎，严复）、《天演论导言一》（赫胥黎，严复）、《世界之霉》（普路斯，周作人）、《文明的曙光》（须林娜，胡愈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事在人为，“顾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3](59-60)}《世界之霉》（普路斯，周作人）中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物霉菌相类比，强调竞争的重要性，霉菌的“两块斑点，黄的与桂黄的，他们正在开战呢”。^[10]这一时期的外国选文，主张竞争，强调人事，进化论下的世界观一扫传统以来的“平和”^[11]观念，转变为冲突、壮美的风格。从清末到民国、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中国已开始摆脱传统束缚，走向充满理想、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旅程。摆脱传统，面向未来，构成了现代精神的主旋律。

(2) 昂扬的现代精神还体现在对少年的咏叹方面。选文中少年活动都围绕着当时新教育的空间——学校展开，如《亚美利加之幼童》，为保家卫国，慷慨解囊，捐款购买军舰。少年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学校，如《小豪杰放洋记》《荒岛游历记》，或在海上冒险，浪迹天涯，或面对复杂的环境，智勇双全，经过艰难险阻，最终获得成长。又如《医院中侍疾之童子》，这位少年到医院探病，所面对的并非自己的父亲，仍然精心照顾。再如《神坛狼厄》，少年面对群狼，镇定勇敢，用火逼退了狼群。这些小说，在各种各样的时空背景下构建英勇、智慧的少年形象，这些少年也是“青春希望的修辞符号”，^[12]选文中少年的成长，也为建构新中国提供了一种可期待的新方式。

(3) 现代精神除激昂慷慨、青春希望外，还有一种转型期寻求发展的内心焦虑。众所周知，五四时期被新文学影响的教科书编者抱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开始选入大量外国翻译作品，这些作品以写实方法呈现出人生各种问题。社会结构转型，新旧文化剧烈碰撞，

内心失去平衡，各种矛盾在此聚焦，各种人生困惑亟须解答。“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6](83)}这些问题与人生关系巨大，“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珊格尔夫人自叙传》（珊格尔夫人，建人）、《黄昏》（什朗斯奇，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Oli Shrein，周作人）反映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一件美术品》（契诃夫，胡适）、《库多沙菲利斯》（葛夫达利阿谛思，周作人）关注反封建反礼教问题；《安乐王子》（王尔德，周作人）、《禁食节》（潘莱士，沈雁冰）、《卖火柴的女儿》（安徒生，周作人）反映社会贫困问题；《先驱》（哀禾，周作人）、《巨敌》（高尔该，沈雁冰）涉及自由与剥削问题；《齿痛》（安特来夫，周作人）、《晚间的来客》（库普林，周作人）与人生人性问题有关。这些作品之所以被选录，就是因其“注重现实人生”及“时代精神”，这些选文从之前重视古代先哲圣贤的遗训，转变为把握民众及人类情感的方式，一扫传统文学封建、保守的文化病症。

二、差异特征：三套教科书语体多样化，选文内容价值取向各有侧重

1929年，阮真在《几种现行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分析研究》一文中，采用比较的方法，凸显出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1924）三套教科书各自的编选特点。其概括了这几套教科书在语体和内容上的差异：第一，语体差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文言白话兼顾，《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均为白话，《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1924）皆为文言。第二，内容差异。《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1924）较为“偏重道德价值”层面，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更加侧重人生社会层面，“灌输新思想”。第三，艺术价值的不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古文时文、旧诗词剧曲、时人议论、创作文艺、翻译小说面面俱到，扩展了“旧文艺的眼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目的在“提倡新文艺”，而《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1924）多选入“古色古香的诗文”。^[13]

阮真对三套教科书编选特点的揭示，针对的是教科

书中所有选文。具体到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呈现两大特点:其一,语体形式方面,不同教科书语体多样化。三套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语体特点各不相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语体为文言白话兼顾,共入选外国翻译作品37篇,文言语体的外国翻译作品8篇,所占比重为21.6%,白话语体的外国翻译作品29篇,所占比重为78.4%。1924年沈星一编辑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白话文言分编,《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是为了弥补古文读本的不足,所选的15篇外国翻译作品皆为白话语体,且倡导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所选的7篇外国翻译作品语体皆为文言。其二,文学内容方面,选文内容价值多样化。三套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所体现的内容价值诉求,也各有侧重。《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1924)中外国翻译作品多为白话语体,内容价值便倾向于关注人生;《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中语体皆为文言,内容价值便偏重道德层面;《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1924)注重讨论与人生相关的问题、国语国文发展的问题,从《劳工神圣》《新生活》《国文之将来》《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这些选文题目便可看出;《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中的外国翻译作品出自异域,大多关注少年成长,洋溢着激昂慷慨的西方的、现代的、发展的风格,但经过晚清包天笑等人的翻译,也进行了中国化的处理方式,又体现了传统的道德特征。教科书中所选外国翻译作品的人物是中国式样的,如《雪合战》中主人公是无意犯错的少年“胜家望”和鼓励知错就改的“张公霖”,作品中的内容价值并没有抵触传统礼法,《亚美利加之幼童》讲述爱国的少年,《雪合战》中打雪仗误伤老人的少年“胜家望”在鼓足勇气向老人赔礼道歉后终获原谅,《神坛狼厄》中少年凭借智慧逼退群狼,《医院中侍疾之童子》中童子服侍病重老人,《肉券》则刻画了朋友之情、夫妻之情。

结 语

1923年—1928年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同和异,其本质上是在时代文化语境下教科书编者对教育思潮、课程标准感知理解后的产物,属于编者感知课程的范畴。这里至少有多个要素对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入选产生过作用:

其一,文化语境。社会变迁、教育文化转型等共同

融汇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时代语境。从文化变迁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新文学得到提倡,外国翻译文学作品大量引进,小说成为主流,文学艺术性得到重视,文学关注人生成为社会风尚。从教育转型来看,这一时期三套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其分别是:周予同、范祥善、吴研因、顾颉刚、叶绍钧、王云五、胡适、朱经农、沈星一、黎锦熙、沈颐、庄适、任鸿隽等,他们或留学日本、美国,或经过清末新教育的培养,或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名校,是经过新教育洗礼后的新型知识分子,必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方面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更能接受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更倾向于西方纯文学的形式及欧化的语体特色,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内涵。

其二,教育思潮、课程标准的影响。教科书的编写往往受到教育思潮影响、课程标准的指导,经审定后才能出版发行。在这一时期审美教育思潮影响下,《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1923)已开始接纳外国翻译文学作品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教科书接受乃至推广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其三,编者的理解感知。随着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不同的教科书编者对于课程标准的感知理解不同。就教科书编者来说,其知识结构、价值取向、身份构成、同人关系、师生情谊、同学友情、所在出版社的性质、对师生教学的理解等等,都可影响对课程标准的理解,甚至影响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编选。

自同人团体、文学观念入手,选择译作。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为例,37篇外国翻译作品,其中周作人、沈雁冰、胡愈之、耿济之、刘复、胡适翻译者共计25篇,所占比重为67.6%。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沈雁冰、胡愈之、耿济之、刘复等译者与教科书编者叶绍钧、顾颉刚,均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些译作的入选,一方面体现了志同道合同人之间的友情利于外国翻译作品的入选,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理念上的接近,即在文学观念上,编者和选文的译者都主张外国翻译作品应是“为人生的文学”,同时也介绍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沈雁冰、胡愈之译作的入选,除文学研究会一层关系外,他们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教科书选文的编选。胡适所译的外国作品入选,与其国文教育专家、国语文学的倡导者、翻译家、本套教材编写参与者的身份相关,体现了编者对自我翻译外国作品质量的自信。所以,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面貌,是在文化语境、教育思潮、课程标

准、编者理解感知多种因素下建构出来的。在当下教科书编选中，不同教科书选文的面貌，总能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鲁迅作品的编选，总能引起一片讨论，但讨论的背后，并没有以文化语境、教育思潮、课程标准、编者理解感知等多个维度去透视其选文面貌背后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周予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1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2.
[2] 沈星一. 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1册（黎锦熙、沈颐校）[M]. 上海：中华书局，1924：1-2.
[3] 周予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2册（王云五等校订）[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4] 赵景深. 晨报副刊[N]. 1922-03-04（3-4）.
[5] 西川勉. 俄国底童话文学[J]. 夏丏尊，译. 小说月报，1921，12（号外）：211-214.
[6] 沈星一. 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3册[M]. 上海：中华

书局，1925.
[7] 周予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5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18-119.
[8] 鲁迅.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鲁迅自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48.
[9] 耿传明. 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
[10] 周予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4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24.
[1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 坟·热风·呐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5-121.
[12] 梅家玲. 教育，还是小说？一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M]//陈平原，等.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97-118. 梅家玲.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与晚清“少年论述”的形成[M]//陈平原，等. 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64-79.
[13] 阮真. 几种现行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分析研究[J]. 岭南学报，1929（1）：101-113.

Selected Texts from Translation Works of Secondary Chinese Subject Text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ndarin Outline

GUAN Xian-qiang (Soochow University)
ZHENG Guo-m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ranslation works have been selected in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and gradually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However, few scholars analyses translated works in Secondary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ndarin Outlin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paper takes translation work in 3 series of secondary Chinese textbooks(New system of Mandarin Textbooks; The new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in Mandarin reading;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as a subject, and the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translation works in 3 series of textbooks have a lot in common, which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artistic value and the modern spirit; Secondly, in the aspect of style and content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orks are showing a variety of features; Thirdly,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of selected translation works were affected by cultural context, educational thought, curriculum programming and the editors' persona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mandarin outline; textbooks of secondary Chinese subject; translation works